

纪南城与楚郢都

尹弘兵

关键词:纪南城 郢都 栽郢 郢郢

KEYWORDS: The Jinan City Capital Ying Zai Ying“栽郢” Xun Ying“郢郢”

ABSTRACT: Analyzed wit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the references of relevant historic literature, the Jinan City in present-day Jingzhou Prefecture, Hubei Province was the location of Capital Ying of the Chu State in deed, but it was just the Capital Ying in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but not that in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Jinan City began to be the capital of the Chu State probab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iddle phase of Warring-States Period or around the early and middle phases of Warring-States Period and was abandoned in 278BC when it was captured by Bai Qi. It might be King Su of the Chu State who moved capital to Jinan City in the fourth year of his reign, which was 377 BC. In the bamboo slips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Geling Cemetery in Xincui County, the text “the year when the King moved (the capital) to Xun Ying 郢郢” is read; the “Xun Ying” would refer to Jinan City.

纪南城遗址位于现在荆州城北 10 里处,城垣至今保存完好,以北城垣最为完整,城外护城河遗迹明显,宽约 50~60 米,1961 年被公布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古城址,城垣周长 15506 米,面积达 16 平方公里,大于现存的荆州砖城。

纪南,因在纪山之南而得名。据《三国志》之《吴书·朱然传附子绩传》所记,吴赤乌十三年(公元 250 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不克而退。……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可知至迟三国时已有纪南地名。又据文献记载,东晋末年,桓玄败死后,其侄桓振攻陷江陵,挟持晋安帝,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攻破襄阳,进屯纪南,刘毅、刘道

规、何无忌等在长江一线与桓氏势力交战,屯于江陵之马头,桓振击破鲁宗之,刘毅、刘道规等乘机攻破桓振在江津的大营,即日克江陵城,桓振溃走^[1]。由这两次战事来看,纪南之地,在当时的江陵城以北,纪山之南。当时的江陵城则在今荆州城的范围内。据考古发掘,荆州城南垣部分始筑于东汉时期,三国时期的土城已埋入地下 3 米多深,顶部宽达 10 余米,当属关羽所筑,晋以后历代均有修补,至五代时外部包砖,城址始终没有离开现存城墙的范围^[2]。

至于纪南城之名,目前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晋,《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曰:“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以后在《荆州记》、《水经注》、《括地志》等著作中均有记载,并沿用至今。

作者:尹弘兵,武汉市,430077,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

第 9 期

· 55 总 823 ·

一、纪南城的性质

(一)纪南城是楚郢都

早在杜预之前,就有楚郢都在江陵的说法,《史记·货殖列传》称,“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汉书·地理志》则说,“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自杜预起,学者更明言楚郢都在江陵以北之纪南城,除上引《左传·桓公二年》杜注外,杜预在《春秋释例·土地名》中说得更为明确,“楚国都于郢,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东有小城名郢”。《后汉书·郡国四》南郡“江陵”条下说“有津乡”。梁刘昭注引《荆州记》则称,“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按《荆州记》凡五种,分别为晋范汪,刘宋庾仲雍、郭仲产、盛弘之,南齐刘澄之所作,以盛记最为有名,刘昭所引未详何家,但应在南齐以前。可知晋宋间学者,不仅肯定纪南城为楚郢都,更明确记载了江陵县、纪南城及郢城的相对方位,与今天的实际情形基本相合,这也是汉晋江陵位于现今荆州城的证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也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唐人著作如《括地志》、《史记正义》等皆谓楚郢都在纪南城或江陵,其后历代学者皆承其说。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纪南城及其四周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纪南城的城垣至今保存较好,面积要比现在的荆州城大3倍多,城垣残存高度3.9~7.6,上部残存宽度10~14米。城垣现有缺口28处,经考古勘察,已查明有城门7处。城外有护城河,在城外一些低洼地带遗迹尤为明显,其中以北垣、东垣南段、西垣北段外最为清楚;护城河距城垣外坡一般为20~40米,环绕城垣,和城垣的形状基本一致^[1]。在纪南城内,东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城内有宫殿区、作坊区,经勘探发

现了84处夯土台基,发掘了一处宫殿、两处城门,探出了宫城的两道宫墙和东宫墙外的城壕。宫城内有许多的大型夯土台基,有的排列很有规律,在这些建筑台基周围都有厚厚的瓦砾层和水井等遗迹。其中,经过发掘的松柏30号建筑遗址,分上下两层,其上层建筑F1的规模很大,中有主体厅堂,外有檐柱、散水等排水设施,其建筑规模与秦都咸阳的宫殿建筑类似。在城内还发现了作坊、窑址等不少遗迹,并出土了铜、铁、铅锡、竹木、陶器等大量遗物,尤以井圈、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生活器具居多。

在纪南城外,则发现了大量的楚墓。高级贵族墓多集中在纪山、八岭山等地,一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远望密密麻麻、巍峨如山。已发掘的天星观1号墓,是一座身份明确的楚国封君墓,但在江陵楚墓中还不算最大,这就暗示我们,此地还应该有比封君墓规格更高的楚墓。虽然同等级的墓也会有大小之分,但墓葬规模的差异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排除有规格上的差别。例如正在发掘的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位于纪南城东北方向约26公里,是一处由主冢、陪冢、车马坑、殉葬墓和祭祀坑组成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熊家冢在20世纪50年代时尚存有高大的封土堆,直径超过100米,高10余米。199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曾联合对熊家冢进行了考古铲探和地球物理勘探,结果显示其主墓坑口长宽约70米,面积约4900平方米;椁室长宽达20余米,面积约400平方米^[2]。2006年8月,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熊家冢墓地外围的车马坑和殉葬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现已发现一座大型车马坑和33座小车马坑,大车马坑长达133.2,宽11~12,深约2米。已清理的一座小车马坑(CHMK 33)葬有一车二马,马面部有大量玉片作为装饰。在主冢南面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殉葬墓92座,陪冢北面发

现有 35 座殉葬墓, 现已清理主冢的殉葬墓 36 座, 出土以玉器为主的遗物 1000 余件。祭祀坑则发现有 190 余座, 已清理 5 座, 深度在 6~8 米, 一般在坑底部埋有一件玉璧^[1]。熊家冢主墓的墓坑和椁室的规模与面积之大, 墓地的规格之高, 是一般大型楚墓无法比拟的。对比天星观 1 号墓, 其墓坑原长 41.2 米, 宽 37.2 米, 面积约 1500 平方米; 木椁长 8.2 米, 宽 7.5 米, 面积为 61.5 平方米^[2]。可见, 熊家冢墓地的规格显然远远超过了天星观墓地, 其墓主极有可能就是某位楚王。

当然, 从地理位置来看, 熊家冢楚墓很可能不属于以纪南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 更有可能是属于以当阳季家湖楚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但在纪南城附近的八岭山和纪山, 也有多座与熊家冢同规格的大型楚墓, 它们属于以纪南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如纪南城西北的双冢, 大冢直径超过 100 米, 高约 14 米。八岭山的平头冢, 直径约 100 米, 高约 14 米, 下半部呈两级台阶状。八岭山的冯家冢, 底径不小于 85 米, 高 12.5 米, 形似覆斗, 底面为方形, 顶面较平, 四周均有台阶。这种覆斗形的墓冢还有刘家冢等。据《汉书·张汤传》记载, 西汉时张汤“调茂陵尉, 治方中”。唐人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方中, 陵上土作方也, 汤主治之。”可见汉代帝王陵上的封土为方形。而已发掘的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王墓, 封土平面呈方形, 由下至上筑三级台阶, 底边南北长 110 米, 东西宽约 92 米。推测这种有特大的覆斗状方形墓冢的楚墓, 有可能就是楚王墓^[3]。

仅就此而论, 纪南城就不会是一座普通的城邑, 而应具有都邑的规模和性质。除这些高级贵族墓外, 在纪南城外还发现了数十处一般贵族和平民墓地, 每处墓地的中、小型楚墓动辄成千上万, 墓中也往往会出土十分精美的文物。这些平民墓地一般距纪南城较近, 最近者仅 100~500 米, 稍远者亦不过 4~5 公里, 说明墓地的主人为纪南城内的

居民。综合这些考古资料来看, 纪南城确为楚郢都, 与文献记载吻合。

(二) 纪南城非春秋郢都

楚国自武王末年迁都于郢^[4], 至东迁时止, 前后以郢为都长达 400 多年。纪南城应为楚郢都, 但这 400 年间楚郢都是否一直在纪南城, 却是很值得怀疑的。

首先纪南城的年代到不了春秋早期。对纪南城西垣北门和南垣水门发掘所获的遗物表明, 城址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5], 这一结论与楚始都郢的年代明显不符, 论者往往以此作为否认纪南城为楚郢都或楚始都之郢的证据。不过早期都邑未必有城, 就考古实证而言, 已知的三代都邑, 如二里头、殷墟和丰镐, 均没有发现城垣。早期郢都没有城垣, 在文献方面也是有证据的。《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楚令尹囊瓦(子常)“城郢”, 楚大夫沈尹戌评论说:“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卑, 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 诸侯卑, 守在四竟。慎其四竟, 结其四援, 民狎其野, 三务成功。民无内忧, 而又无外惧, 国焉用城?”沈尹戌在这里明确说到“国焉用城”。杜预也认为早期郢都是没有城的^[6]。可见早期郢都是否有城, 至少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因此并不能单纯以城址的年代来否定纪南城为楚武王始都之郢。如果考虑到早期郢都不一定有城, 不把城垣作为郢都的最重要证据, 那么郢都作为一个都邑, 在考古遗存上就只是一个大遗址而非城址, 因为城垣完全有可能是后来才修筑的, 城址的年代并不就是纪南城始为郢都的年代, 也不能作为否定纪南城是楚郢都的充分证据。

由于不能以城垣为标准进行判断, 这给我们从考古实证的角度来论证或否定纪南城为郢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这里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是纪南城是否为楚郢都, 这个问题前面已作了论证, 纪南城确为楚郢都; 二是纪南城自何时起成为楚郢都, 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由于没有城垣这一最为明

显的都城标志,就只能从年代、聚落规模、遗址等级、出土遗物、人口多寡等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是年代,纪南城的考古发掘资料虽未全部发表,但现有资料已足以表明,纪南城遗址的年代早不到春秋早期楚武王或文王的时代。据《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纪南城西垣北门所叠压的遗迹和遗物,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南垣水门木构建筑的木柱建造在古河道 4A 层和 4B 层之中,其尖端被河道中第 3 层所覆盖,因此木构建筑的年代应早于第 3 层,晚于 4A、4B 层或与 4A、4B 层相当;第 3 层出土遗物的年代上限至春秋晚期,下限至战国中期,4A、4B 层的年代则在春秋晚期。松柏 30 号建筑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物的年代下限为春秋晚期,上限有可能早到春秋中期,但据报告,此建筑遗址早期遗物数量很少,故年代上限难以确断;晚期建筑的年代下限至战国中期,上限则为战国早期。城内发掘的水井、窑址,其年代上限均不早于春秋中期。城内还发现有陕家湾和东岳庙两处墓地,其年代上限也只到春秋中期,可能是纪南城筑城以前当地居民的墓葬^[1]。可见就目前已知的材料而言,纪南城遗址的年代最早也只能到春秋中期,与楚武王或文王始都郢的年代即春秋早期明显不合,难以作为楚始都之郢。由于纪南城遗址的年代根本到不了春秋早期,因此当时的聚落规模、人口多寡、遗址等级、出土遗物等方面也无从谈起。而且从纪南城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年代虽可早到春秋中期,但所获遗物极为稀少,说明迟至春秋中期时纪南城遗址还只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居民点,到了春秋晚期时遗物才稍多一些。由此可知,纪南城遗址不仅没有春秋早期的遗物,而且整个春秋时代,纪南城遗址也只是一个很小的聚落,这样一个遗址不可能是春秋时的楚郢都。

在文献方面,则疑点更多。童书业先生依据《左传》所记楚国史事及春秋时列国形

势,认为春秋时楚都及楚核心区当偏北,不得远至江陵,而应在汉水中游一带,具体地说,春秋时楚郢都当在淅川之南、宜城之北、荆山之东、汉水之西^[2]。石泉先生则在此基础上作了更加深入、全面的论证,力主郢都当在今湖北宜城县南境的蛮河流域^[3]。童、石二先生所论,主要依据《左传》所记春秋时楚国史事所反映出来的楚人活动范围、活动路线、地理形势,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相对方位、距离等作仔细研究而得,其研究结论基本复原了春秋时的楚国地理形势,并非据后世地记而来。而且这些结论正与纪南城考古发掘的结果一致。

由上可知,无论是文献分析还是考古发掘资料,都可证明纪南城不是春秋时的楚郢都。

二、纪南城作为楚郢都的年代

由于纪南城的年代与楚始都郢的年代不合,《左传》所记春秋时期的楚国也不在江陵一带,而当在偏北的汉水中游地区。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春秋郢都与战国郢都可能不在一处,战国郢都在纪南城,春秋郢都则在纪南城以北的汉水中游,纪南城的郢都是战国时期从别处迁来的,而纪南城的规模也表明这应是一处战国时期的都城遗址。

那么,楚郢都究竟是何时迁到纪南城的呢?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郭德维先生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及城内外的墓葬资料,认为纪南城兴建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此时楚国在位诸王为昭王(公元前 515~489 年)、惠王(公元前 488~432 年)、简王(公元前 431~408 年)、声王(公元前 407~402 年)。唐人余知古的《渚宫旧事》有“楚昭王避敌迁郢,楚惠王因乱迁堰”的说法,郭德维认为惠王迁堰虽无史可证,但惠王时有白公之乱,则余知古之言或有所本。一般认为“堰”即“鄢”,即宜城楚皇城,郭德维则认为此“堰”或指纪南城,今纪南城北有武昌义地,

旧名大堰城,或与惠王所迁之“堰”有所关联,因此他认为将郢都迁到纪南城的应是楚惠王^[1]。张正明先生则认为楚昭王时有吴师入郢之役,郢都经此一劫后必然残破,昭王复国后又大败于吴,楚人震恐,迁郢于郢,而昭王是否返郢,史书中并无记载,他据此认为将郢都迁到纪南城的是楚昭王^[2]。

但以上意见,仍不免猜测的成份居多。要判定纪南城从何时起为郢都,不能简单地将考古材料和历史事件加以比附,我们首先仍然要从考古材料入手,准确判定纪南城的年代。但由于纪南城的发掘资料未经全面整理,对该遗址进行综合分期显得十分困难,目前只有王光镐先生曾加以尝试^[3]。而即使做好了分期工作,也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遗址从什么时候起变为都城,以何种标准来判断,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能从分期中直接得出结论。就算以城址作为标准,能够准确判定纪南城遗址进入城址期的时间,问题还是存在,纪南城也不一定一筑好就成了郢都,楚人立刻就将都城迁到这里。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些,不拘泥于纪南城本身,而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把江陵地区以纪南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或有可能别开蹊径。我们或可从江陵地区规模巨大的东周聚落群发展、兴起、衰亡的过程中,分析出江陵地区作为楚核心区的的时间,这一时间段很有可能就是纪南城作为楚郢都的时间。

如果纪南城成为楚国都城,其周围地区必然就是当时楚国的核心区。核心区的标志之一是人口,由于纪南城的郢都是从外地迁来的,因此人口的大量集中与其作为都城的初始年代应是基本同步的。纪南城周围墓葬的发掘资料已有了大量积累,我们可以从这些墓葬在各个时间段的分布,推断出纪南城人口突然增加的准确时间,并进而推导出纪南城聚落群最繁盛的年代,这一年代大概就

是江陵地区成为楚核心区和纪南城成为楚郢都的大致时间。

以纪南城为核心的沮漳河下游地区,主体部分属现在的荆州市荆州区,原为江陵县辖区,包括荆门市南部。这里自然环境优越,物产富饶,是楚文化考古最重要的地区,楚墓分期的标尺就是依靠对纪南城周围大量楚墓的发掘整理来确立的。在纪南城周围25公里范围内分布的大量楚墓,和纪南城有着密切的联系,应是当时城内居民的墓葬。据郭德维统计,纪南城周围有高大封土的楚墓,总数达1260多座,这些大、中型贵族墓一般距纪南城较远;下层贵族墓和平民墓则分布在距纪南城较近的地区,依照1999年的统计数据,已发现的达5000余座,已发掘的近3000座^[4]。可见,沮漳河下游的荆州、荆门一带作为楚文化核心区当无疑义。

此一区域成为楚核心区的年代,可以从江陵雨台山墓地和九店墓地的资料来作一些初步推断。九店墓地,1995年出版的发掘报告共报道了597座墓葬,可分期的有481座。其中,西周晚期墓1座,春秋墓共19座,战国早期墓19座,战国中期早段墓47座,战国中期晚段墓急剧增加到203座,战国晚期早段(白起拔郢以前)的墓葬为158座,战国晚期晚段(白起拔郢以后)墓葬骤减至34座^[5]。各期所占比例,西周晚期为0.2%,春秋时期为3.95%,战国早期为3.95%;战国中期早段为9.8%,中期晚段为42.2%,合计战国中期为52%;战国晚期早段为32.8%,战国晚期晚段为7%。

结合墓葬类别来分析,九店墓地的乙组墓共分四期七段,前四段(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中期早段)共69座,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甲类墓有3座,皆不出铜礼器;战国中期晚段有甲类墓15座,其中大多数为铜、陶礼器共出;战国晚期早段有甲类墓4座,战国晚期晚段则不见甲类墓。

由九店墓地的资料可知,整个春秋时期,这一带人烟稀少,墓葬数量很少;战国早期墓葬稍有增加,至战国中期早段又有一定增加,但也不多。而且春秋至战国中期早段,甲类墓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出铜礼器,表明不仅人口总数极为有限,而且居民的等级也很低。战国中期晚段墓葬急剧增加,这是九店墓地的最鼎盛时期,较高等级的甲类墓数量也大为增加,且均为铜、陶礼器共出,说明人口数量和等级都在急剧上升。战国晚期早段墓葬开始减少,表明墓地开始进入衰败期,较之最鼎盛的战国中期晚段已大为逊色,但也相当可观,仍远优于其他各时段。战国晚期晚段为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以后,江陵地区成为秦之南郡辖地,此期的楚文化墓葬应是楚遗民墓;这一时期楚文化墓葬数量的锐减、甲类墓的消失及秦人洞室墓的出现,与白起拔郢以后政治形势的剧变相吻合。

江陵雨台山墓地,1984 年出版的报告发表了 558 座楚墓,其中能分期的有 423 座。其中,春秋中期(一期)仅 9 座,春秋晚期(二期)65 座,战国早期(三期)115 座,战国中期(四、五期)195 座,战国晚期(六期)39 座^[1]。各期所占的比例,春秋中期为 2.1%,春秋晚期为 15.4%,战国早期为 27.2%,战国中期为 46.1%,战国晚期为 9.2%。但雨台山报告的年代较早,徐少华先生认为,以现在的标准重新审视,属于第一期的 9 座墓均不早于春秋晚期,第二期墓葬中亦有部分可归于第三期,由此推断,属于春秋晚期的墓葬当不足 50 座;第三期墓葬也应有不少属于第四、五两期,这样来看,属于战国早期的墓葬当不足百座,属于战国中期的墓葬则在 200 座以上^[2]。以往认为雨台山墓地与九店墓地相比,主要的差异在于战国早期墓

要远多于后者,经此调整后,两个墓地的年代分布就基本一致了。

总计雨台山和九店两处墓地,年代较明确的墓葬共 904 座,虽然两个墓地的分期不太一致,但我们将时间段拉长,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误差。将两者的墓葬年代合并统计后得到表一,对说明江陵地区楚墓的年代分布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两墓地最盛时期是在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开始衰落,但仍强于其他各时期。

雨台山和九店都是平民及下层贵族墓地,而纪南城周围已知的较高等级的贵族墓大多属战国中晚期,与上述两处墓地的鼎盛期基本一致。例如,目前所发现规格最高的天星观一号墓,墓主为封君,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 340 年前后^[3]。藤店 M1 墓主级别为下大夫,年代基本与天星观一号墓同时,王光镐推定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 年前后^[4]。包山二号墓,墓主为左尹,级别相当于上大夫,年代大体为战国中、晚期之际,发掘报告推断为公元前 316 年^[5];徐少华则认定为公元前 303 年^[6];王光镐亦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 300 年前不久^[7],其绝对年代当以徐说为是。望山一号墓,墓主级别为下大夫,年代在楚威王或楚怀王前期^[8],为战国中期晚段,应早于包山二号墓,晚于天星观一号墓;望山二号墓和沙冢一号墓的墓主级别均为下大夫,年代与包山二号墓相近,均属战国中期晚段。这些墓葬的主人,均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级别从封君到下大夫不等,生前应居住在纪南城或附近地区,其下葬年代均在公元前 340 年前后至公元前 300 年前后,大体上相当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际。

再从纪南城遗址本身的发掘资料来分

表一 雨台山、九店楚墓年代统计表

年代	西周至春秋	战国早期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前段	战国晚期后段
总数	94	134	445	197	34
比例	10.4%	14.8%	49.2%	21.8%	3.8%

· 60(总 828) ·

析。据王光镐的研究,纪南城内的各类遗存可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春秋中、晚期,第二期为战国早期,第三期为战国中期早段,第四期为战国中期晚段,第五期为战国晚期早段。纪南城内的东岳庙 M9、M4,是城内墓葬中最晚的两座,其中东岳庙 M9 属战国早期早段, M4 可能晚到战国早期晚段^[27]。这些城内的小墓和纪南城的存在是对立关系,可知纪南城的兴建至少要到战国早期以后。他进一步推定,只有时代属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际的第四期遗存,才属纪南城城址期。据此得出结论,纪南城只是一个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之际的楚城,存在时间不过四五十年^[28],这与纪南城周围高级贵族墓的年代基本相符。

王光镐所作的年代推定应无问题,但其结论可能过于狭窄,因为我们并不能把纪南城聚落群最繁盛的时期与纪南城的存在时间作简单对应。我们认为,这四五十年只是纪南城作为楚都最繁盛的时期,纪南城周围的遗存以这一时期最为丰富,乃是楚国在战国时代最强盛的威王及怀王前期在考古遗存上的反映。怀王后期,即公元前 312 年的秦楚丹阳之战以后,楚国国势急转直下,到了公元前 300 年以后,强大的楚国已是日落黄昏,大势渐去,纪南城也随之进入了衰败期。但不能说怀王后期至顷襄王前期时纪南城已被废弃,因此纪南城作为都城及楚核心区的下限,仍当以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为界。至于纪南城作为楚都及楚核心区的上限,也不应限于战国中期晚段。在迁徙的情况下,墓地开辟是有一个滞后期的,当楚都迁到纪南城后,至少要过了一个时段以后才会大规模出现迁徙到此的居民的墓地,所以我们不能假定墓地的年代与遗址完全同步。尤其是贵族墓,在纪南城附近出现的时间有可能比平民墓更晚一些,因为贵族墓还有归葬的可能性。郭德维指出,江陵的郢是从别处迁来的,楚王族在别处应早有陵园,迁徙

之初,楚高级贵族可能还是归葬回原来的陵园,只有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才会在江陵的郢附近开辟新的陵园。一些有封地的高级贵族,则可能葬回自己的领地。另外,如包山二号墓和望山一号墓的墓主均为邵姓,为楚昭王的后裔,是后来新兴的贵族,这些新贵族可能放弃原来不太显赫的葬地,另在郢都附近开辟新的葬地^[29]。以此而论,纪南城作为楚都及楚核心区的上限,至少应比其最繁盛的战国中期晚段要早一个时间段,当在战国中期早段或战国早、中期之际为宜。这一结论也与雨台山和九店的平民墓地所反映出纪南城突然兴盛的时间基本相符。

由此可见,纪南城应是整个战国中、晚期的楚国都城,它作为楚都的开始应在战国中期早段或战国早、中期之际,终结废弃的时间则当是公元前 278 年。那么,究竟是哪一个王,又出于何种原因把都城迁到纪南城?在楚国的历史上,战国中期早段或战国早、中期之际,正当楚悼王(公元前 401~381 年)、楚肃王(公元前 380~370 年)在位时期。这一时期的楚国,正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吴起变法及悼王死后贵族作乱,射杀吴起,并中悼王。“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30],肃王即位后,“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31]。经此变乱,楚国的旧贵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此后的楚国政治舞台,除屈氏外,几乎见不到春秋时期的旧贵族。由于发生了这样大的变乱,当事件平息后,肃王有可能放弃原来的都城,另迁新都。

三、郢郢与栽郢

楚肃王徙郢,传世文献无证。但新蔡葛陵楚简中有“王徙于郢郢之岁”、“王自肥还郢徙于郢郢之岁”的记载^[32],这个“王徙于郢郢之岁”在葛陵楚简中多次出现,可见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故以此作为纪年。关于葛

陵楚墓的年代,发掘报告依据出土遗物和竹简记载,认定“约相当于战国中期前后,即楚声王以后,楚悼王末年或稍后,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左右”^[33]。此处所指公元前340年恐为笔误,按楚悼王纪年为公元前401~381年,据此订正,原报告所推断的葛陵楚墓绝对年代实际应为公元前380年左右。李学勤、刘信芳先生排定葛陵楚简所记历日,推定“王徙于郢郢之岁”为公元前377年,即楚肃王四年,墓主平夜君成于此年去世,是为葛陵楚墓的绝对年代^[34],此年代与考古类型学推定的年代基本相符,李、刘之说可从。可知楚肃王四年时,曾从郢迁往郢郢。

那么,楚肃王“徙于郢郢之岁”、“自肥还郢徙于郢郢之岁”是否就是迁都呢?《说文》称,“徙,迻也”;“迻,迁徙也”。迻同移,是为迁徙、迁移、移动之意。《玉篇》则说,“徙,迁也”。黄锡全先生认为,“王徙于郢郢”,不同于“王于郢郢”(王在郢郢),“王居于某郢”(王居住在某郢),“王复于蓝郢”(王再次到蓝郢),“王自肥还郢”(王从肥回到郢)。因此“王徙于郢郢”虽不能理解为王迁都到郢郢,但可以说明楚王因某种原因有较大的迁移动作,值得关注^[35]。

黄锡全的看法相当谨慎,但检索文献,当“徙”、“徙于”的主体是王、国、族时,通常是用来指迁都、迁国。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相徙于商丘。”

《史记·伍子胥列传》:“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郢。”

《史记·周本纪》:“周乃东徙于洛邑。”

《史记·鲁周公世家》:“楚顷王东徙于陈。”

《史记·六国年表》:“徙于巨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昌平君徙于郢。”

《汉书·地理志下》:“(卫)文公徙封楚

丘,三十余年,子成公徙于帝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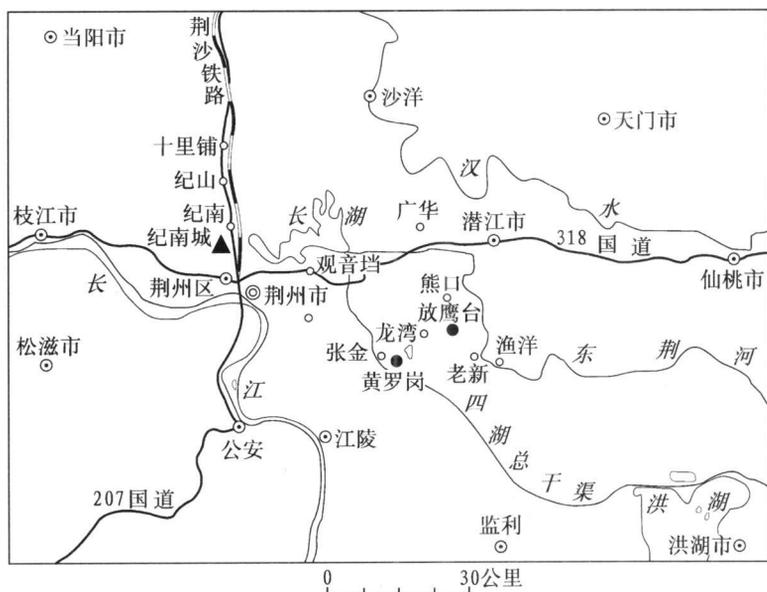
《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人谋徙于阪高。”

《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

《诗·小雅·正义》引《世本》:“懿王徙于犬丘。”

上述“徙于”、“徙”,均指国都之迁徙。上引楚简资料中已有“王于郢郢”、“王居于某郢”、“王复于蓝郢”、“王自肥还郢”等,而“王徙于”既不是“王于”、也不是“王居于”或“王复于”、“王还”,而只能是某种较大程度的移动、迁徙。由此似可推测,当“徙”、“徙于”的行为主体是王、国、族时,往往是指国都或整个国、族的迁徙。因此,“王徙于郢郢之岁”、“王自肥还郢徙于郢郢之岁”就很有可能是楚肃王将都城从原来的郢都迁到郢郢。郢郢所在,何琳仪先生认为是商丘附近的寻,即古之斟寻,原属卫地。葛陵楚墓的年代,原发掘报告定为楚悼王末年,而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救赵攻魏,“军舍于林中,马饮于大河”,此次战役长达三年,楚军深入魏境,其北路到达卫之寻地,是完全有可能的^[36]。但黄锡全认为,楚虽一度占领该地,似不可能仓促设置郢,因为该地非久居之地,不宜王居;“王自肥还郢徙于郢郢之岁”,是楚王从肥地回到郢都后再迁移至“郢郢”,肥地在今安徽肥水流域,而“郢”与“郢郢”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则这个“郢郢”估计不会远在河南商丘;而江陵附近有“寻平”的地名,见于湖北沙市周家台秦简,地在竟陵与江陵之间。于是黄锡全从当时的郢都在纪南城出发,推断此郢郢为潜江龙湾的楚王宫遗址或黄罗岗城址^[37](图一)。

但实际上,葛陵楚简甲三:30有“城郢”的记载,这表明,“郢郢”是一座城池而非宫殿,因此不可能是潜江龙湾的楚王宫遗址。至于龙湾的黄罗岗城址,目前还没有做过工作,其与龙湾楚王宫遗址的关系还不清楚。



图一 纪南城及龙湾遗址位置示意图

郢郢的可能性要大于龙湾楚王宫遗址或黄罗岗城址。第三，葛陵楚简明确记载楚肃王是从“郢”徙于“郢郢”，前一个“郢”当是指原来的郢都，而“郢郢”则是新的郢都。且葛陵楚简还有“城郢”的记载，表明这个“郢郢”是一座城而非别宫、游宫。迁都之后，郢郢成为正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楚人也不再称郢郢而径称为郢，于是郢郢就成了郢都。

另一个有关的问题

但从龙湾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楚王宫遗址面积很大、建筑规格极高，且整个遗址区的面积很大，达 108 平方公里，涵盖了古城址区、宫殿基址区和多个墓葬区等^[38]，应是楚王的一处游宫所在。龙湾遗址区当是楚王的游猎区，即史籍常称的所谓“云梦”。也很难想像楚王在龙湾时不住如此豪华的游宫却去住黄罗岗城址。由此推断，郢郢是黄罗岗城址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郢郢不是潜江龙湾的楚王宫或黄罗岗城址，那么是否郢郢就是江陵的纪南城遗址呢？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结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郢郢就是战国中、晚期的楚都纪南城的可能性很大。首先，江陵附近有“寻平”的地名，表明江陵一带曾有“寻”称，因此纪南城在迁都之前和迁都之初被称作郢郢也是有可能的。其次，黄锡全考定郢郢为龙湾楚王宫或黄罗岗城址，是以战国时期郢都一直在纪南城为基点的，但纪南城作为都城的年代，最早也只能到战国中期早段。而葛陵楚简所记“王徙于郢郢之岁”的年代为公元前 377 年，即楚肃王四年，相对年代正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因此纪南城就是

“栽郢”^[39]。栽郢的地名，亦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在出土文献如鄂君启节、望山楚简、包山楚简和天星观楚简等都有发现。从上述出土文献来看，楚王曾多次在栽郢会见国宾，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纪南城即栽郢^[40]。但此说也有人怀疑，刘信芳将此字释为“栽”，认为“栽”即卜辞、金文中的“戔”，“戔”与祭祀、征伐有关，“栽”即柴祭。栽郢就是在郢都之郊举行“栽仪”，也就是柴祭的地方，建有楚王的游宫，地在郢都城以南五十里处。于是刘信芳将郢都地望北迁四十里，移至今江陵阴湘城，从而把纪南城腾出来安置栽郢（栽郢）^[41]。但学术界普遍认为，纪南城当为战国郢都所在，这一结论目前很难动摇，因此以阴湘城为郢都颇不可信，学界几乎无人附和。但释栽郢为举行“栽仪”的祭祀之地，并认为此地建有楚王之游宫，则深具卓识。于是吴郁芳先生在刘氏之说的基础上继续论证，他从纪南城即是战国郢都出发，认为栽郢是楚人在郢都附近所建的一座用以郊天祭地的宗教性都邑，包山楚简有“东周之客□□归胙于栽郢”的记载，归胙原是宗教礼仪，自当在宗教场所进行。《国语·楚语下》

谓“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其牛”，可知史籍所载楚王之游猎，亦有宗教祭祀的原因，并不仅是游玩而已，因而作为郊天祭地之所的栽郢，当位于楚王的云梦游猎区，亦即史籍所载之云梦章华宫。现存的潜江龙湾遗址，距纪郢正在“远郊百里”的范围内，其规模、性质、地望皆与古云梦相合。因此，吴郁芳认为栽郢非纪郢，龙湾遗址就是楚“云梦”、“栽郢”的遗址^[1]。从鄂君启节“王居于栽郢之游宫”来看，栽郢之宫室乃楚王之游宫，并不是正规的都城宫殿。鄂君启节中本有“郢”与“栽郢”两个不同的地名，且明记载郢有王之游宫，可知栽郢实非郢都，而只是楚王之游宫。史载楚王好游猎，而龙湾遗址范围达 108 平方公里，正合楚王游猎之用。刘、吴之说可从，龙湾的宫殿遗址当为供楚王游猎之用的游宫，即鄂君启节所载“栽郢之游宫”，而纪南城为楚国正都，不可能是有游宫之栽郢。

龙湾的楚王宫遗址既然是鄂君启节所载之栽郢，就不当为郢都，这也是郢都可能为纪南城的旁证。总之，以纪南城为初迁之时的郢都，后来的郢都，以龙湾楚王宫遗址为栽郢之游宫，要比以纪南城为栽郢、以龙湾遗址为郢都，在相互关系上略显合理一些。

四、结 语

楚郢都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虽然学术界一般相信纪南城应为楚郢都故址，但其地理位置与文献所记春秋时的楚国地理形势明显不符，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纪南城不可能为春秋郢都所在，因此纪南城只可能是战国时的郢都，是从别处迁来的。本文主要是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试图凝聚共识，缩小分歧，主要从纪南城东周聚落群的兴衰来推定江陵地区作为楚核心区的时间，这一时间段也当是纪南城作为楚郢都的时间。同时结合新出

文献资料，提出纪南城应为战国中、晚期的楚郢都，即新蔡葛陵楚简记载的楚肃王所迁之郢都。这里只是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以就教于方家。但纪南城自何时起成为楚郢都，还是要依靠纪南城自身都城形态和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外围聚落群毕竟也只是间接证据。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将来对纪南城作更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也有待于更多的资料积累。

附记：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 05JJDZH 244

注 释

- [1] 参见《晋书》卷 10《安帝纪》、卷 7《桓彝传附虔子振传》、卷 9《桓玄传》及《宋书》卷 5《宗室传·临川烈武王道规传》。
- [2] 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区博物馆：《荆州城南垣东端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 年第 4 期。
- [3] 本文中有纪南城的各种数据，均引自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 [4] 田野：《重放异彩——楚文化考古重大发现》第 48、49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5]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考古发掘简讯》，《江汉考古》2008 年第 2 期。
- [6]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 [7] 田野：《重放异彩——楚文化考古重大发现》第 46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8] 关于楚都迁郢的具体时间，有文王、武王二说。传统说法一般据《史记》之《楚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地理志》认为文王始都郢，另一说则据《世本·居篇》和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认为楚武王时已徙郢。自清代以来，宋翔凤、童书业等学者均主张武王说，石泉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认为楚武王晚年迁郢当更可凭信。可参阅石泉：《楚都何时迁郢》，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352、353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擯⁹爆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 3 4期。

擯¹爆 《左传》昭公十四年,杜预注曰:“楚徙都郢,未有城郭。”

擯¹爆 同擯⁹爆

擯¹爆 童书业:《春秋楚郢都辨疑》,见《童书业历史地理论文集》第 213~221页,中华书局,2004年。

擯¹爆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擯¹爆 郭德维:《楚郢都辨疑》,《江汉考古》1997年第 4期。

擯¹爆 张正明:《楚史》第 238 24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擯¹爆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下编第四章“江陵纪南城的分期与年代”,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擯¹爆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 255、27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擯¹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

擯¹爆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擯²爆 徐少华:《从南漳宜城出土的几批蔡器谈春秋楚郢都地望》,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第 16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擯²爆 同擯⁹爆

擯²爆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 45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擯²爆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第 33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擯²爆 徐少华:《包山二号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 4期。

擯²爆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 45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擯²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擯²爆 东岳庙 M 4 M 9原报告定为春秋中晚期,王光镐先生据江陵雨台山和当阳赵家湖的分期

资料改定为战国早期,此说可从。

擯²爆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 440~449 第 45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擯²爆 同擯¹爆

擯³爆 《吕氏春秋》卷 2《开春论》之“贵卒”。

擯³爆 《史记》卷 6《孙子吴起列传》。

擯³爆 “王徙于郢之岁”的纪年在新蔡葛陵楚简中出现多次,“王自肥还郢徙于郢之岁”则见于葛陵简甲三:240。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擯³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第 184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擯³爆 a. 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2004年第 7期。

b. 刘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1期。

擯³爆 黄锡全:《楚都“郢”新探》,《江汉考古》2009年第 2期。

擯³爆 何琳仪:《新蔡楚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 3期。

擯³爆 同擯³爆

擯³爆 湖北省潜江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潜江龙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擯³爆 此字有多种释法,或释为“哉”、“茂”等,释为“栽”字在楚文化研究界较为流行,本文从之。

擯⁴爆 a. 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见《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b. 张正明:《楚史》第 24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c.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 45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擯⁴爆 刘信芳:《释“栽郢”》,《江汉考古》1987年第 1期。

擯⁴爆 吴郁芳:《栽郢·云梦·章华宫》,《江汉考古》1989年第 3期。

(责任编辑 杨 晖)